

中国农户贫困的测量及 影响因素研究

◎ 毕洁颖 著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 毕洁颖 著

中国农户贫困的测量及 影响因素研究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农户贫困的测量及影响因素研究 / 毕洁颖著. —北京: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7. 12

ISBN 978-7-5116-3464-1

I. ①中… II. ①毕… III. ①农户-贫困问题-研究-中国
IV. ①F323.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321986 号

责任编辑 李 雪 徐定娜

责任校对 贾海霞

出版发行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北京市中关村南大街 12 号

邮编: 100081

电 话 (010)82109707 82105169(编辑室) (010)82109702(发行部)
(010)82109709(读者服务部)

传 真 (010)82106626

网 址 <http://www.castp.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建宏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 092mm 1/16

印 张 11.75

字 数 199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6.00 元

内容提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减贫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随着贫困人口减少，扶贫工作必须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其中的关键问题是精准识别哪些人通过何种方式长期稳定脱贫。本书采用收入贫困、支出贫困和多维贫困三种测量方法对贫困人口测量进行比较研究，通过交叉识别精准识别贫困人口，建立二元选择模型和多元选择模型研究贫困农户的致贫原因及贫困型、恶化型、改善型农户贫困变动原因，所得结论对于丰富多维贫困测量体系、精准识别贫困人口、确定贫困退出机制和精准帮扶贫困人口具有实践应用价值和政策参考意义。

本研究的创新性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采用一套短面板数据进行收入贫困、支出贫困及多维贫困三种贫困测量方法的比较研究。这样能够更有效的反映不同测量方法的优点和局限性，同时通过年际变化的比较分析反映农户贫困规模、贫困深度和贫困结构的变化，将贫困研究的视角从静态拓展到动态，更全面地反映中国贫困状况。第二，在多维贫困测量指标体的设计上进行有益的探索。增加了食物安全和社会关系维度，丰富了多维贫困指标体系，并通过了严谨的稳健性检验。作为一套可操作性强的多维贫困测量体系，该体系有利于农村贫困人口的精准识别和精准瞄准，也为 2020 年后中国新扶贫标准的制定提供了参考。第三，根据农户贫困状态的变化建立多元选择模型，重点研究分析了贫困型、恶化型、改善型农户贫困变动的影响因素，并将收入贫困和支出贫困、多维贫困的影响因素进行比较，为纠正单纯依靠收入贫困方法可能造成的政策偏误提供了实证依据。

两轮调研的测量方法和数据处理支持了上述创新性分析。本文基于的陕西省镇安县、洛南县，云南省武定县、会泽县，贵州省正安县、盘县 6 个县 114 个村 1 368 个农户 2010 年和 2012 年两轮调研数据为进行比较研究提供了宝贵的

数据基础。主要研究结论如下：①采用不同测量方法，计算的贫困发生率、贫困深度和贫困结构均不同。收入贫困发生率高于多维贫困，支出贫困发生率最低。随着多维贫困程度的加深，多维贫困人口的食物安全、教育、借贷状况更差，更亟须改善，这也验证了在中维贫困测量体系中，加入食物安全和社会资本维度是对国际上现行多维贫困指标体系的有效补充。②各测量方法识别的贫困人口差异显著。综合来看，多维贫困的交叉识别比例最高，其次为支出贫困，收入贫困的交叉识别比重最低，因此，采用收入贫困的方法遗漏支出贫困和多维贫困农户的比例高，而多维贫困方法最大程度的包含了各类贫困农户。③不同因素对各贫困类型影响有差异。仅户主年龄对收入贫困、支出贫困和多维贫困有一致的影响。老年抚养比高的农户易发生支出贫困，外出人口增加、户主教育程度的提高、户主参加培训可以降低收入贫困，有慢性病成员会提高农户收入贫困发生的概率。户主参加培训可以降低多维贫困发生的概率，遭受经济冲击是导致多维贫困的显著因素。④两轮调研数据表明，收入贫困波动最大，其次为多维贫困，支出贫困相对稳定。40.3%的农户收入贫困状态发生变化，14.3%的农户支出贫困状态发生变化，31.65%农户多维贫困状态发生变化。不同贫困类型变动的影响因素有差异，健康状况、是否参加培训、是否遭受冲击是主要影响因素。

据此，本文提出了如下政策建议：第一，在精准识别中应重点采用多维贫困的测量和识别方法。随着建档立卡工作的开展，精准识别贫困人口要充分考虑收入贫困、支出贫困和多维贫困方法的差异。第二，重点增加贫困人口的打工收入。尤其要支持季节性非农活打工收入和非季节性打工收入是提高贫困人口收入的重点，而这一类打工收入的提高需要长期培训等针对贫困人口的人力资本投入及其他“造血”性政策的实施。第三，有针对性地采取对贫困人口的食物供给和补贴等政策。针对贫困人口的食物安全和营养问题，尤其要重视对蔬菜、肉、蛋、奶类食物的补贴，同时长期内要形成贫困人口的营养改善计划，在减贫目标中加入食物安全与营养目标。第四，扶贫重点要放在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将多维贫困各维度的状况作为扶贫资金投向的参考依据，并将扶贫工作重点放在贫困人口的培训等能力建设以及贫困人口的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

关键词：收入贫困，支出贫困，多维贫困，影响因素

目 录

1 绪 论	1
1.1 研究背景	3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8
1.3 研究内容和方法	9
1.4 研究的创新点和下一步计划	10
2 文献综述	13
2.1 贫困的定义	15
2.2 贫困的经济学理论	16
2.3 贫困的测量	21
2.4 贫困的影响因素	24
2.5 贫困的动态性	26
2.6 贫困的瞄准	28
3 数据与方法	31
3.1 数据	33
3.2 方法	36
3.3 样本县基本情况介绍	39
4 农户贫困的测量与识别	43
4.1 引言	45
4.2 收入贫困、支出贫困与多维贫困介绍	45
4.3 收入贫困、支出贫困与多维贫困测量	55
4.4 收入贫困、支出贫困与多维贫困交叉识别	68
4.5 小结	71

5 农户贫困的影响因素分析	75
5.1 引言	77
5.2 理论依据与影响因素选择	77
5.3 模型选择与设定	79
5.4 模型结果与解释	80
5.5 收入贫困、支出贫困及多维贫困交叉识别的影响因素	99
5.6 小结	104
6 贫困的进入和退出	107
6.1 引言	109
6.2 贫困进入和退出情况	109
6.3 贫困进入与退出影响模型选择与设定	110
6.4 模型结果与讨论	111
6.5 小结	116
7 结论与政策建议	119
7.1 主要研究结论	121
7.2 主要政策建议	123
7.3 进一步研究方向	124
参考文献	127
附录	141
致谢	177
作者简介	179

1 绪 论

1.1 研究背景

贫困与饥饿是国际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据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告（World Bank and IMF，2015）显示，2011 年全球每日生活标准低于 1.25 美元的极端贫困人口约 10 亿人，占总人口的 14.5%。2015 年世界银行将极端贫困标准调整为每日生活标准低于 1.9 美元，按照该标准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贫困人口比例从 2002 年的 29.1% 下降到 2014 年的 4.8%，其中中国在该贫困标准下贫困发生率为 4.1%。据 Evan Hillebrand（FAO，2011）分析，1981—2005 年中国每日生活标准低于 1.25 美元的贫困人口减少了 6 亿多人，贫困发生率由 85% 下降到 17%，可以说 1980 年以来全球贫困人口的减少主要是中国做出的巨大贡献。

虽然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市贫困有增加的趋势，但中国的贫困在很大程度上仍是农村的贫困问题（王小林，2013）。自 2011 年国家统计局确定农民人均纯收入 2 300 元（2010 年不变价格）的新国家扶贫标准，到 2015 年底，中国农村贫困人口从 2011 年的 1.28 亿人下降到 5 575 万人，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到 5.7%（国务院扶贫办，2016）。随着贫困人口的减少，中国扶贫工作进入了啃“硬骨头”的阶段，确保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扶贫开发工作依然面临十分艰巨而繁重的任务。中国扶贫政策已经从“大水漫灌”式的扶贫变成有针对性的“滴灌”式扶贫，即“精准扶贫”，要将扶贫政策落实到村到户，并作出部署，要求通过产业扶持、转移就业、易地搬迁、教育扶贫、社保政策兜底等实现全部脱贫。这就为精准扶贫提出了关键问题——精准识别哪些人通过何种方式脱贫。

与中国巨大的减贫成就不相协调的是，中国在贫困理论研究，尤其是贫困测量、识别与瞄准等方面的研究严重不足，难以满足需求。长期以来，我国的扶贫开发存在着贫困人口数量不清、情况不明，政策措施针对性不强，扶贫资金和项目指向不准等问题（国务院扶贫办，2014）。这就要求精准扶贫，政策落实到户。为实现国务院提出“科学扶贫、精准扶贫”目标，需要鉴别出谁是贫困农户（who）、他们主要分布在哪里（where）、为什么贫困（why）等问题。

为此,中国实施了精准扶贫工作机制,通过对贫困户和贫困村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和精准考核,实现扶贫到村到户。但在实施过程精准扶贫存在以下问题:首先,确定贫困人口数量时采用收入贫困的标准,但在实际识别时采用多维贫困的概念,两种方法可能导致贫困人口数量和人群的差异;第二,贫困人口的数量以收入贫困人口数量按照一定比例上浮,该方法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尚待验证,上浮比例的确定具有主观性,同时贫困人口数量预先设定,决定了识别的农户为相对贫困农户非客观的绝对贫困农户;第三,贫困人口数量逐级分解分配存在一定主观性;第四,贫困人口识别越到基层,透明性越差,贫困户识别度降低,缺乏一套明确的贫困人口识别指标体系和明确的操作指导及监督机制;第五,部分贫困户帮扶措施与贫困户实际需求不一致;第六,缺乏对贫困识别及帮扶的动态调整机制等问题。本文针对这些问题展开研究,希望能在贫困的测量方法和标准、贫困的识别、致贫原因、贫困动态管理和帮扶措施方面提供有益的探索及相应政策建议。

1.1.1 世界减贫研究的主要问题

2015年联合国就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达成一致,提出了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其中第一项目标即在全世界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从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其他目标来看,国际社会广泛关注贫困与平等、贫困与妇女赋权、贫困与失业、贫困与营养健康等,可以说,国际社会不仅关注贫困人口的收入,也关注贫困人口的发展能力及机会等诸多角度。

1.1.2 中国农村精准扶贫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扶贫开发工作经历了一个不断演变的历史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救济式扶贫、体制改革推动扶贫、开发式扶贫、扶贫攻坚、综合扶贫开发、全面小康建设六个阶段(引用)。第一阶段(1949—1978年),规模较小的救济式扶贫,解决贫困人口的最基本生存需要。第二阶段(1978—1985年),通过体制改革推动扶贫,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一系列制度创新,为农村经济的超常规增长和贫困人口的急剧减少提供了强劲动力。第三阶段(1986—1993年),大规模开发式扶贫,完成从单纯救济性扶贫到开发性扶贫的转变,真正提高贫困人口摆脱贫困的能力和贫困地区自我发展

的能力,使他们获得脱贫致富、发展经济的机会,进而从根本上解决温饱问题。第四阶段(1994—2000年),以特殊困难区域为重点的“八七”攻坚扶贫阶段。第五阶段(2001—2011年),综合扶贫开发阶段。以《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为指导,将扶贫瞄准对象从贫困县转向贫困村、贫困户,并采取了整村推进、产业化扶贫、劳动力转移、移民搬迁、全面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一系列扶贫措施。第六阶段(2011至今),以提高发展能力为核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发展阶段。以《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为指导,巩固温饱成果、加快脱贫致富、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发展能力、缩小发展差距,提高扶贫对象自身发展能力,推动贫困地区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汪洋副总理提出以改革创新为动力,扎实推进扶贫开发工作。要加快对贫困户建档立卡,做好精准识别、因户施策,把“大水漫灌”式的扶贫变成有针对性的“滴灌”式扶贫,建立干部驻村帮扶制度,使帮扶措施直接到村到户到人,全面提高扶贫开发工作的实效。提出摸清贫困人口的分布、贫困户的贫困程度及贫困原因,是搞好扶贫工作的重要基础(刘娟,2010;李周,2013;黄承伟,2015)。

根据2011年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2010年不变价格)的新国家扶贫标准,2011年中国有1.28亿名农村人口处于贫困线以下,占全国总人口的9.5%,2015年贫困人口减少至5575万人,虽然中国农村的贫困状况持续改善,但贫困人口数量随贫困线的调整波动显著(图1-1)。每一次贫困标准的提高都带来贫困人口规模的大幅波动,扶贫对象发生显著变化,扶贫政策也需要作出相应调整(附表1.1)。

伴随着扶贫开发进程,我国扶贫目标瞄准政策也经历了由瞄准集中连片地区、到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到贫困村、到户到人的演进。国家在不同时期,针对不同的贫困人口分布特点,采取了不同的识别与瞄准办法。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世纪末,中国贫困人口分布集中,主要分布在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因此采取了区域瞄准政策;随后,针对贫困人口“大集中、小分散”的特点,扶贫开发主要以县为单位组织实施,覆盖率较高。这种扶贫方式的优点在于,它可以通过各县经济的快速增长,使贫困状况有所缓解。但是,在实际中却存在着不少问题,贫困县为了追求经济增长,在安排扶贫资金、发放扶贫物质时往往会挑选条件相对好的贫困人口甚至是非贫困人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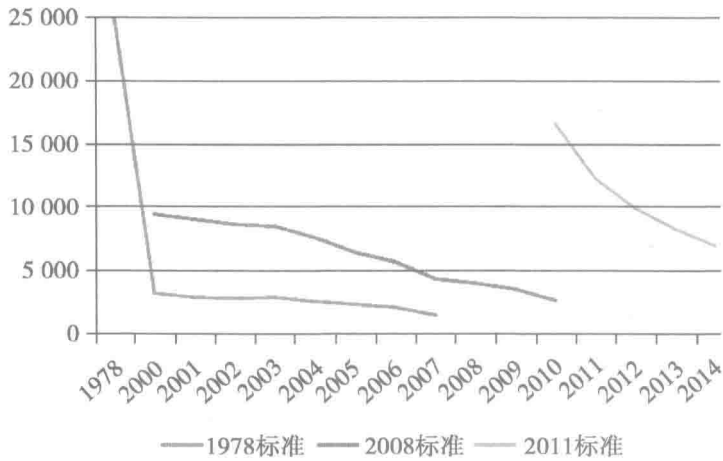


图 1-1 2000 年以来中国农村贫困人口数量随贫困线调整的波动 (单位: 万人)

因此,以贫困县为扶贫对象的做法往往会出现对贫困人口的偏漏。20 世纪 90 年代初,我国财政扶贫方式发生转变,确定财政扶贫以贫困户和贫困户占绝大多数的贫困村为对象。进入 21 世纪,农村贫困人口分布状况发生变化,区域性贫困现象明显减少。在贫困县,贫困人口也主要分布在偏远、交通不便、自然条件恶劣的贫困村。贫困人口分布的新格局要求更具针对性的改革扶贫方式,扶贫开发必须到村入户。因此,“整村推进”成为新时期实现《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 年)》目标的一项关键措施。2011 年后,随着贫困人口进一步减少,致贫原因差异性凸显,瞄准贫困对象和致贫原因、到户到人的精准扶贫开始实施。

近年来,中国农村贫困出现一些特征(国务院扶贫办,2015):第一,中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不断增长,增速自 2000 年以来呈波动上涨趋势,但 2011 年以来,增速逐年放缓。贫困县农村居民收入增速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但绝对收入差距增大。第二,贫困县转移性收入比重增长最快,工资性收入比重上升,家庭经营性收入比重下降,财产性收入增长缓慢,反映出非农收入对贫困地区收入增长的重要贡献,但与农村平均水平相比,贫困县工资性收入比重、财产性收入比重仍偏低,而农业经营性收入比重、转移性收入比重偏高。第三,贫困县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已得到显著,但生活燃料、饮水、卫生等生活设施仍需改善。取得炊事燃料、饮用水困难的农户比重、无卫生厕所农户比重仍较高。第四,由于贫困地区大多自然条件恶劣,生态环境脆弱,脱贫难度很大,

已经解决温饱的群众，因灾、因病返贫问题突出。

同时，扶贫开发机制亟待改进，扶贫开发政策体系与政策效率等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改进。一是阶段性政策具有一定局限性，尤其是扶贫工作以农村经济的快速增长和政府输血式救济为主，一方面政府的财力有限；另一方面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缺乏提升（汪三贵，2015），因此面临扶贫政策效应减弱的问题，这与现行的以收入贫困为贫困测量和识别标准、重经济增长而轻发展能力的政策有关，因此需要探索适应和注重提升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的贫困测量和识别标准。二是贫困的评估和考核体系仅关注收入，导致对农村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体系投入不足，尤其是农村社会保障严重滞后，改善农村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需要对农村的居民生活条件、健康、教育、医疗等有客观的认识，因此需要总更广义的角度定义和了解贫困状况。第三，随着贫困人口分布越来越分散，“真扶贫、扶真贫”的难度加大，尤其是由于基层扶贫工作与中央减贫目标之间的错位，扶贫工作人员能力的制约，贫困人口的识别和瞄准受到很多学者的质疑，本研究也尝试提出有利于精准瞄准的方法和政策建议。四是考虑到贫困瞄准及动态监测和适时调整的难度，应注重参与式扶贫模式的开发，同时资源筹集和配给机制需要进一步优化，尤其是应发挥中央与地方投入、社会捐助、个人负担、国际合作等多方协同机制。

1.1.3 2020 年后的中国贫困问题

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目标要求，其中在扶贫领域的目标为：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按照“十三五”扶贫攻坚规划，到2020年将有3000万名左右贫困人口通过产业扶贫发展产业脱贫，2000多万名贫困人口通过转移就业、易地搬迁、教育扶贫、健康扶贫、生态保护、财政兜底等途径脱贫，届时按照现行贫困标准的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一个问题是假设现行扶贫标准下贫困人口能够全部脱贫，2020年后贫困如何界定？继续提高收入贫困线识别新的收入贫困？还是采用相对贫困？或者采用多维贫困抑或主观贫困？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外出打工人口的贫困问题、增长的城市贫困问题日益突出，如何统筹城乡贫困标准？本研究对收入贫困、支出贫困和多维贫困的比较研究可以为2020年后贫困的界定和测量提供参考。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1.2.1 研究目的

本文针对我国扶贫开发存在的贫困人口数量不清、情况不明,政策措施针对性不强,扶贫资金和项目指向不准等问题,基于贫困的定义,比较研究贫困测量的方法,提出适应精准扶贫需要、满足需求的适用性、可操作性测量方法;分析贫困的影响因素,将人群进行分类,根据人群特征及主要致贫因素,与脱贫攻坚的主要途径相结合,指导扶贫识别与瞄准;研究贫困的进入和退出变化,为实现稳定脱贫、贫困动态管理和退出机制提供参考。

具体来说,本研究分别比较收入贫困、支出贫困、多维贫困测量方法,通过贫困发生率、贫困深度、贫困结构比较三种测量方法下的贫困状况并比较各方法下识别贫困人口的特征差异,为建立适合农村精准扶贫的多维测量体系提供参考,并为2020年后新扶贫标准的制定提供思路。建立二值选择模型研究影响收入贫困、支出贫困和多维贫困的因素,将人群按照生计类型及致贫因素进行分类,比较不同测量方法下致贫因素影响的差异,将研究结果与脱贫攻坚的主要途径相结合,精准识别哪些人通过何种方式脱贫。研究两轮数据下贫困的进入和退出变化,并建立多值选择模型比较不同贫困测量方法下变动的差异,指导贫困的退出机制设计。

1.2.2 研究意义

一是学术意义。首先,采用一套农户数据进行三种贫困测量方法的比较,对于系统研究贫困测量、贫困标准的制定提供了实证基础,为其他学者进行相关研究提供了参考。从贫困发生率、贫困深度和贫困结构三个方面反映贫困状况,既丰富了贫困的内容又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贫困的原因。在多维贫困研究上,本文在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利用数据优势增加了食物安全和社会关系两个维度,丰富了多维贫困测量体系,为其他国家多维贫困测量提供了借鉴。不同测量方法结果的差异,尤其是收入和支出数据的差异分析,也将有利于指导农户调查关于收入和支出的设计,为其他学者提供借鉴。

二是政策意义。在研究结果的基础上,希望本文能通过收入贫困、支出贫困、多维贫困测量对中国农村贫困做出综合判断,实现精准测量,为扶贫工作中的精准识别和精准瞄准提供依据。对影响农户贫困的主要因素及影响程度的研究,尤其是比较不同测量方法下致贫因素影响大小的排序,对于实施有针对性的政策具有指导意义。对贫困的进入和退出动态性以及影响因素的研究,对于确定贫困退出机制、精准预测和精准帮扶具有借鉴意义。

三是资料意义。本文将搜集整理中国农村贫困问题的文献和数据,尽可能全面了解农村贫困现状和特征,并采用科学的抽样方法对中国农村贫困人口进行实地调研,获取丰富可靠的第一手资料,此外,本文希望能尽可能全面系统地整理研究贫困问题的理论和方法,为以后的研究奠定基础。

1.3 研究内容和方法

1.3.1 研究内容

基于研究目的,本文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主要内容。一是农户贫困的测量,采用收入贫困、支出贫困和多维贫困的方法回答在每种测量方法下有多少农户贫困?贫困程度如何?在哪些方面贫困?比较三种测量方法下结果的异同,并回答现行采用收入贫困是否准确衡量了贫困状况。二是贫困的影响因素分析,比较在各种测量方法下贫困的可能影响因素及各因素的贡献大小和排序,探索研究每种因素的影响机制,并为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提供依据。三是农户贫困的进入与退出,采用动态视角利用两轮数据研究贫困的进入和退出,并分析可能的影响因素,为贫困的退出机制及动态管理和制定长期的稳定政策提供建议。

本文将分为七个章节,除以上三部分主要内容外,第一章引言介绍研究背景,主要从全球减贫进展及面临的问题、中国农村贫困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中国扶贫政策轨迹及研究需求方面反映本研究的必要性,同时介绍本研究的研究目的和意义,内容与方法及创新点和下一步研究计划。第二章文献综述分别从贫困的定义、测量方法、识别、影响因素、动态性、瞄准和反贫战略与措施方面,综述主要进展及仍需回答的问题,从而明确本研究的具体问题。第三章

介绍本文的主要方法和数据。第七章总结本研究的主要结论、政策建议、讨论及下一步研究计划。

1.3.2 研究方法

一是文献研究。通过文献研究的方法,了解国内外贫困问题研究现状,详细梳理贫困测量、识别和瞄准的文献,掌握相关的经济理论和分析方法,收集中国农村贫困状况的二手数据为深入研究奠定基础。

二是调查研究。通过多阶段抽样方法选取样本,对贫困地区农户进行实地入户调研,为实证分析提供数据支撑。本文采用数据为2010年基线调研数据和2012年回访数据,回访率达到70%,采用两年的短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其优势体现在:第一,与一年调研数据相比,两轮调研数据的比较可以反映农户贫困规模、贫困深度和结构的变化;第二,分别比较两年农户收入贫困、支出贫困和多维贫困的变化,能够更有效的反映三种测量方法的优劣势;第三,各维度、指标在两轮调研中的变化可以为确定政策的方向、力度提供参考依据;第四,在影响因素分析中,利用面板数据,可以消除一部分农户本身特征带来的影响,从而使得对影响因素及其影响的判断更为客观、可靠。

三是定量研究。结合成熟的贫困测量方法,比较收入、支出和多维贫困测量方法,探索适合中国农村精准扶贫的多维贫困测量方法,建立选择模型,研究贫困的影响因素,在贫困的动态性理论上建立多值选择模型研究贫困变动的影响因素及原因,采用两轮数据进行估计。

1.4 研究的创新点和下一步计划

1.4.1 创新点及特色之处

第一,以往的贫困测量研究多采用一种方法进行测量,在测量方法比较上,多将收入贫困与支出贫困进行比较(张晓波,2014)或收入贫困与多维贫困进行比较(王小林,2016),本研究分别采用收入贫困、支出贫困及多维贫困三种贫困测量方法,并进行综合比较,能够更有效的反映不同测量方法的优劣势,更全面地反映中国贫困状况。